

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与 美国早期汉学的转型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 American Sinology

赵晓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Zhao Xiaoy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7

[Abstract]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merican missionary history. New theological concepts and convictions spurred a large-scale deployment of well-educated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abroad for the missionary cause. China was a new field, and the high quality of missionaries was a new phenomenon. It transform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provided personnel resources fo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inology that had previously relie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missionaries and diplomats.

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是美国基督教会于19世纪80年代形成的以奋兴高等教育机构人员的宗教精神和安排他们到国外传教的运动,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它将传教范围从美国国内扩大到

国外,传教人员从基督教内部扩大到基督教以外。将大批学生志愿人员派到国外,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不但加强了传教队伍的力量^①;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教队伍的成分,传教成员不仅是受过神学训练的传教士,更多的是受过高等专业技术训练的大学生。从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来说,它促使了由传教士、外交官为主的美国早期汉学队伍向由科学化、专业化的专职人士的转型,为这种转型提供了不但从专业上受过训练,而且对中国有具体生活工作经历的专业人员。本文试图对学生海外传教运动以及对美国早期汉学的转型做初步的研究。

—

宗教生活在美国社会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教会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宗教机构,而是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和文化机构。基督教神学中的千禧年观念揭开了19世纪末的传教新概念,相信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上帝将在世上实行千年统治。异教国家缺乏福音力量,正在遭受魔鬼撒旦的统治,派遣传教士在耶稣复临之前拯救异教徒是每个教会的职责,在基督第二次在世界上出现之前,福音必须传遍全世界,这个结论清楚地要求到海外广布基督教福音成了教会最急迫的任务之一。

1810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 B. C. F. M.)成立。1829年10月14日,28岁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受派来华,拉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美国对华传教运动的序幕。但此

^①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s in China, 1890 - 195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55.

时的海外传教活动还是局限在教会内部，传教人员也都是受过神学训练的职业牧师。

19世纪80年代，海外传教运动扩展到美国教育界，高等教育机构出现赴外国传教团体。188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黑门山(Mt. Hermon)的“大学生暑期圣经学校”，100名立志到海外传教的青年联合发表了“普林斯顿宣言”(Princeton Declaration)，以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为基础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正式形成，提出了著名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1897年，神学家詹姆斯·S·丹尼斯(James S. Dennis)提出了传教运动的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即消除传统社会的罪恶和传播西方社会的新理想，号召传教士应该“通过建立改造社会的机构使自己成为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①。传教运动的目标逐渐从单纯的拯救个人灵魂转而强调建立“基督教化”的社会秩序，按照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改造世界文化，最后实现整个世界的西方化。神学家们指出无论布道、治病还是办学都是传布福音的中介，无论是通过医疗传教方式或是教育传教方式，提高非基督教国家人们的地位是基督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②。这种新式的传教观念和方法不但为传教活动开拓了新路，而且也为吸引更多的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加入到传教队伍里来，成为海外传教运动能扩大到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前提。

^① James S. Dennis,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Progress: A Social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7, vol.1, p.452.

^② Robert E. Speer,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The Student Missionary Enterprise, Addresses and Discussion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898, pp.201 - 216.

将思想、讨论和行动都集中在“现代世界的福音化”上,这是“学生立志传道运动所定的标语”^①。它探讨了基督教福音的社会意义,认为福音不仅包括宗教生活,亦包括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他们很少关心“属于个人得救的问题”^②,而是关心“整个社会或整个民族的得救问题”,而关心整个社会或整个民族的得救必须对他们有更精深、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对传教国家的认识和研究成为一件必须的宗教任务。神学观念的转变成为美国早期汉学的转型提供了宗教认同和支持。

19世纪后期,随着对西部开拓完毕和垄断组织经济力量的加强;美国出现了领土扩张狂潮,首要目标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统治一个落后文明的唯一方法是影响其青年一代人的思想、实践、品格和关系,造就明天一代合适的领袖”^③,让他们在“设立新标准”、“走入新途径”时,“受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是教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教会必须立即行动,决不能“失去这种卓绝的机会”^④。学生志愿传教运动迅速成为美国海外扩张的重要部分,并得到历届美国政府的支持^⑤。美国中国研究专家费正清说“20世纪初我们看到美国边界的主要海外扩张集中在中国”^⑥。

① 马泰士著、张仕章译,《穆德传》,青年协会书局,1935,第90-91页。

② 赵真颂译,《饶申布什社会福音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6,第14页。

③ 穆德,《世界上的建设力量与破坏力量》,《穆德全集》卷四,第876页。

④ 马泰士著、张仕章译,《穆德传》,第364页。

⑤ 邵玉铭,《宗教与美国对外扩张主义》,《中美关系研究论文集》,(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⑥ 费正清,《70年代的任务》,《美国历史评论》,1969(3)。

二

美国汉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如果从源流上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可以说是在反欧洲传统“汉学”的境况下诞生的^①。所谓欧洲传统“汉学”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描述出来的一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他们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带有迷幻赞美色彩的“想象式建构”^②。

欧洲汉学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发现产生了研究中国的大量文献。美国研究中国要晚得多，最早只能追溯到19世纪中叶，因为美国商业资本和海外传教活动向中国扩张比欧洲晚得多。商业资本和传教活动形影不离，这是老式资本主义扩张的规律。1829年美国传教士随着美国首批来华商船在广州登陆，美国最初的中国学家就是从这些来华传教士中培养出来的，如裨治文、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等。裨治文1830年到广州，1832年创办《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报导中国的历史、风俗、时事和传教士活动，是美国最老的中国学杂志，他实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人。

1842年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官正式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比美国历史学会成立的日期还早。1851年陆续出版了《美国东方学杂志》、《美国东方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美国东方学会目

^① 周勤，《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世界汉学》创刊号，第9页。

^②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p.1-9, New York, 1983.

的是为了健全组织体系,加强研究队伍,有系统地进行东方学的研究,与欧洲国家争夺东方思想文化阵地。最早的会员就是裨治文、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等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但“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①,即为美国政府政治、经济扩张服务。1848年出版的卫三畏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标志着美国汉学研究的开始。《中国总论》分上、下两卷,1848年出版,30年后再版时补充了大量内容。全书共分26章,正如此书副标题所示,是一部关于中华帝国地理、政府体制、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的综述。

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的大学开始设立关于东方或中国的教学研究机构。美国大学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于1876年在卫三畏主持下设立于耶鲁大学。这个时期的美国对中国研究的主要兴趣仍然遵循欧洲汉学研究的传统,主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这种古典的中国学十分注意原始资料,所采取的方法是:熟悉语言—翻译史料—进行史料学分析—进行历史编纂学的分析—概括—总结:自发地摸索现象之间的联系,把事情串连在编年的杆轴上。”^②

美国早期的汉学研究主要由非职业化的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承担,其著作一般偏重于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明。研究出于中美双边关系以及研究者本人的职业和兴趣的需要,在对中国历史进行总体研究的同时,更加突出对中国政治史、法制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他们是没有受过训练的职业研究人员,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加了解中国,而达

^① 费正清,《70年代的任务: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② 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第2页。

到其外交和传教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在华势力下降，美国大力扩张在中国的势力。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美国汉学从欧洲古典模式走向现代，把研究的关注点对准了中国的近现代问题，汉学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区域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出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策略的需要，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集团都日益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并给了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以支持和赞助。如 1911 年建立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1913 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936 年建立的福特基金会，都曾大力资助过中国研究。如 1925 年成立的美国太平洋学会、1928 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1927 年建立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都标志着美国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尤为重要的是逐步形成了一支科学的、专业化的研究队伍，他们所从事的微观汉学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而学生海外传教运动则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转型、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人员基础。

先期入华的传教士在对中国有一定程度了解后的充满宗教性的宣传对学生海外传教运动，尤其鼓励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来中国传教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长期在华北传教的清恒理 (Henry Kingman) 请求有志海外传教的学生应该更多地装备高等教育和知识技能来满足中国文化的需要，才能将这个国家基督化^①。这些使美国学生认为让中国成百万学生基督化是他们对中国学生所负

^① Henry Kingman, *The Need of Men and Women of Literary Taste in China*, *Report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Boston, 1894, pp. 242 - 243.

有的特殊责任,就像英国对印度负有特殊责任一样^①。几千年来由知识精英主宰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中国毫无疑问地对即使在本国也只占极少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产生了特殊的传教吸引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白人男子上大学的比例还不到成年男子总数的1%,但传教士中绝大多数人来自于这一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②。他们所受教育是让他们进入社会的专业和政治领导角色,中国给这些寻找发展的年青人和正在发展的传教事业提供了一个有竞争力的地区。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不仅是最大量吸引了学生志愿传教人员,而且最后因为新教外国教士的数量和使用的资金量成为世界的主导传教地区^③。1886至1918年,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派往外国的传教士达8140人,其中1/3,即2524人被派到中国^④。1886年至1936年的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活动中,有5万名大学生参加,其中1万3千人到国外传教,占美国全部海外传教士数目的1/2^⑤。中美关系史上最著名的司徒雷登、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 1884—1968)、卜凯(John Lossing Buck, 1890—1962)、宓亨

① Robert R. Gailey, *The Students of China, Report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1906, pp.192 - 194.

② Valentin H. Rabe, *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s, 1880 - 192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85.

③ 直到1916年,到中国传教的人有5750人,而到印度则有5465人(Harlan P. Beach, Burton St. John, eds., *World Statistics of Christian Mission*, New York, FMCNA, 1916, pp.63 - 65.);到1920年,到中国的资金是美金19075741元,印度是美金17917394元(Interchurch World Movement of North American, *World Survey*, New York, Interchurch Press, 1920, pp.158 - 159.)。

④ Clifton J. Philips,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 1886 - 1920*, John Fairbank edit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05.

⑤ Vergilius Ferm, ed, *An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1945, p.741.

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1891—1947)等都是通过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的队伍来到中国。

三

传教者认为,让福音传遍世界并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听到福音^①。要使基督为普世的人们所认识、所寄托、所敬爱,不但在个人的生活中做到这点,而且在人类所有的关系中,包括实业的、社会的、国家和种族的关系中都要体现基督。由学生传教运动派出的传教人员由此改变了单纯的圣经布道、建立教堂、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传统方法,而是到中国与会有关的教育、医疗机构里从事让福音传遍世界的工作,去迎接基督教会“唤醒中国青年的挑战”^②。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志愿传教人员可以通过个人福音的行为达到社会福音的效果,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改造亚非地区的文明传统,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到了中国的、与青年有更多接触的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而与时代最接近的青年的接触使他们更加了解了当时中国的时代脉搏和进程,学校又给他们提供了认真思索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良好学术氛围。随着美国对华政治、经济的需要,美国汉学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回到美国后又能进入美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使中国研究得以继续,终成一代大师。

下面不完整的名单是为中国研究作出贡献的海外传教士,他

^① Arthur T. Pierson,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The Student Missionary Enterprise, Addresses and Discussion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Boston, 1894, pp.105 - 115.

^②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78页。

们是 1906 年至 1923 年由学生海外传教运动派到中国的最早的专业中国研究专家。

卜凯(John Lossing Buck, 1890—1975)于 1915 年来华,著名农业研究专家,金陵大学农经系首任系主任、教授。作为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奠基人,著作颇多,尤其他基于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研究。其代表作《中国农业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 1930)是他和助手在对 2866 户农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而成,包括农场布置与土地利用、农场周年经营状况、大小适宜的农场企业、耕地所有权与农佃问题、作物、家畜和保存地力、农场劳动力、农家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生活程度、结论等广泛内容;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履鸾译的中译本,影响极大。《中国土地的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A Story of 16786 Farms in 168 Localities and 32256 Farm Families in Twenty-two Provinces in China*, 1929—1933, 1937),涉及了气候、土地、食物营养、家禽与土地肥力的保持、物价及税则、作物、农场企业之大小、农场劳力、农产运销、生活程度、人口等方面;1937 年金陵大学出版了乔启明等翻译的中译本,1941 年金陵大学农学系再译述出版,1971 年台湾学生书局再版。《中国农场管理学》(*Farm Management in China*)(戈福鼎、汪萌元译,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研究提高生产效率及经济利润的方法。还有《安徽芜湖附近 102 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An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102 Farm near Wuhu, Anwei, China*, 1924)(金陵大学农林科 1942 年出版中译本);《直隶盐山县 150 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An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150 Farms Yenshan County, Chihli Province, China*, 1926);《中国农村的所有权和租佃关系》(*Farm Ownership and Tenancy in China*, 1927);《四川省农业概况》(*An Agricultural Survey of Szechwan*

Province, China, 1943);《中国统计中的农业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Statistics*);《中国农业的若干基本问题》(*Some Basic Agricultural Problems of China*)。

贾德(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 鉴于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中国印刷史。他曾两次来华进行学术考察, 仅第二次便停留了 12 年(1911—1923), 在安徽宿州北长老会工作的同时, 搜集资料。《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 Ward, 1931*)便是他的成名之作。当时国际学术界对欧洲印刷术源于德国还是中国发明的西传, 有极大的争议和不同的看法。他旁征博引, 用详尽的史实资料严格的考证既阐明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过程, 又详细描绘了印刷术传入西方的历史轨迹。此书在国际史坛上引起强烈反响, 多次再版。1955 年由傅路特做了详尽的校订和增补后, 再度出版, 可见其学术价值。195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泽炎翻译的中译本。

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 1896—1963), 以浸礼会教士来华, 1922—1927 年任沪江大学副教授, 著名地理学家, 曾到内蒙、西藏和内地调查。代表作《中国地理基础: 土地及其民族概论》(*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1934*), 非常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的地理、民族的概况, 正中书局 1947 年出版了谌亚达的中译本; 台湾开明书店 1973 年出版了薛贻沅的中译本。还著有《亚洲的国家和民族: 地球的 1/3 和人口的 2/3 的地理学》(*Asia's Lands and Peoples: A Geography of One-Third of its People, 1944, 1951, 1963*)(张印堂、刘心务译,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 《五亿人民的国家: 中国地理》(*Land of the 500 Million: A Geography of China, 1955*); 《亚洲的农业区域》(*Agricultural Regions of Asia,*

1934);《苏联的潜力:一个地理学的评估》(*Soviet Potentials: A Geographic Appraisal*, 1962);《十字路口:西南亚的土地和生活》(*Crossroads: Land and Life in Southwest Asia*, 1960);《苏联力量的基础》(*The Basis of Soviet Strength*, 1945)(程鸿、叶立群译,中华书局1948年;王勤育译,开明书店1947年)。

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 1892—1969), 1914年耶鲁大学学士, 1916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1918年以圣道会教士身份来华, 曾将荀子的著述和《前汉书》译成英文, 他还经常在《通报》上发表有关中国哲学中有神论和自然主义的研究成果。后来一直在美国大学或研究机构任教。还著有《中国天文学的发端》(*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Astronomy*);《古代中国的罗马城池》(*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1957)。

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 传教士富善之子, 出生于河北通州。美国大学毕业后又以学生海外传教人员身份回到中国, 任北京协和医学校体育教师, 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助理研究主任。后来回美国后, 任哥伦比亚大学汉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乾隆朝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 Lung*, 1935);《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43, 1957, 1959, 1969, 2000);《中国同亚洲其他地方最早期的接触》(*China's Earliest Contacts with Other Parts of Asia*, 1962);《中国历朝史书中的日本》(*Japan in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中国文明和文化史纲要》(*A Syllabu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1976)。傅路德于1943年完成《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 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 认为它“不仅是一部卓越的综合性专著, 恰如他的注释和目录那样,

它是以广泛的专题论著为基础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美国学者或在美国工作的欧洲和中国学者之手”^①。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国研究中国学的趋势,实际上是逐渐抛弃了以往那文化意义上的汉学,而趋向于更加具有社会科学意义的思想、政治及制度研究,为推动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富有智慧的民族,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方法,但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等方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本书还最早报道了安阳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使西方人对华夏文明的灿烂文明有了新的认识。本书1957年、1959年、1969年多次再版,2000年第四次出版,可见其影响和意义。

解维廉(William James Hail, 1877—?),出生于日本,1906年来华,1913年在长沙创办了雅礼学校,并任校长至1922年,1922年任湘雅医学院教务长。著有《曾国藩与太平天国》(*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with a Short Sketch of His Later Career*, 1927, 1964)。

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 1884—1975),1915年参加以公理会教士来华,任山西铭义中学英文教师。1924年任北京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中国史教师,1927年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他主编的两卷《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选录了清朝800位名人并就其生平和社会活动做了概述。他为了完成写作,曾查阅了1100多卷正史和数百卷“笔记”资料,还利用了国外的有关档案资料。而且还在行文论述时,注明史料的来源和出处,因此,它不仅是部清朝名人的传记著作,而且为研究整个清代的历史打开了至少是资料的大门。

^① John L.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1954, p. 71.

胡适在为此书撰写的前言中,认为它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不但外国汉学家没有完成过如此大的著作,即使中国学者也没有完成与此书相比的作品,任何研究清代政治史、文化史或知识阶层的人,中外关系史,都可以从中获益。费正清认为它是“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将其全部翻译,1990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葛学溥(Daniel H. Kulp, 1888—?), 1913年以浸礼会传教士来华。1915年在上海沪江大学创立社会学系并任教授,是最早在中国讲授社会学的人之一,1925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1918—1919年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市潮安县归湖镇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并据调查著有《华南乡村生活:家庭主义的社会学,第一卷,广东潮安凤凰村》(*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eminism Vol. 1, Phoenix Village, Kwangtung, China, 1925, 1972*)。本书是高等学校乡村社会调查的先驱,至今仍是中国早期社会调查的代表作,1972年美国再次重印了本书,可见其价值。

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 1910年以浸礼会教士来华,1910—1917年任长沙雅礼学校老师,后任耶鲁大学教授。他是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大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学术上的成就使他在美国194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赖氏著述甚多,主要关于中国的有《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1784—1844, 1917*) (陈郁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1917, 1918, 1937, 1946*);《未来的中国》(*The China That Is to Be, 1949*);《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1934*);《基督教扩张史》(*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美国汉学的进步》(*The Progress of Si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1953);《现代中国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56)(吕浦、孙瑞芹译,商务印书馆,1963);《远东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1946)。他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1929)是最早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本中国基督教史。

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1891—1947)于1912年来华,任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系教授,并为《密勒氏评论报》的特约编辑,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1926年回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他有著述多部,《远东国际关系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1, 1955)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之作,商务印书馆1975年出版姚曾廉等译的中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再版;《中国近代史选读》(*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1923);《华侨志》(*The Chinese Abroad, Their Position and Protection,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 1924)描述了中国移民美国的历史过程及美国的排华运动,在当时影响颇大,商务印书馆1928年、1931年出版岑德彰的中译本;《中国新民族主义论文集》(*China's New Nationalism and Other Essays*, 1925);《中国国际关系论文集》(*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Essays*, 1926);《对中国学生的西方历史介绍》(*Introduction to Western History for Chinese Students*, 1922);《在革命中的中国:对民国时期政治活动和军阀政治的分析》(*China in R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Politics and Militarism under the Republic*, 1931);《被占领中国的声音》(*Voice from an Occupied Chinese*, 1944);《中日冲突之真相》(*The Real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938, 1969);《中国赈灾纪实》(*With the White Cross in China*, 1939);《中国》(*China*, 1946);《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Modern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50,

1955)等。

麻伦(Carroll B. Malone, 1886—1973)1911年来华,任北京清华学校历史学教授,直到改为清华大学后才回美,任科罗拉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中国乡村经济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1924,与戴乐仁合著);《清朝时期北京圆明园和颐和园的历史沿革》(*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1934)。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美国早期传统汉学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学生海外传教运动派出的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高等教育人才无疑推动了这一转型。神学观念的改变、传教观念的改变以及国家扩张需要,学生志愿传教运动为这些寻找发展的受过专业高等教育的年青人提供了通过在那个社会里所承认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业来完成他们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抱负的机会,而正是他们的到来使美国早期汉学从非职业化向职业汉学家得以转型,使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迅速,终领世界汉学之前列。